

· 家庭问题专题研究 ·

# 互动视角下婚姻暴力的发生、发展与维持

## ——基于对两对夫妻的访谈研究

向小平, 王晓婷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以互动视角为指导理论,采用目的性方便抽样方法,对两对存在情境暴力的夫妻进行深入访谈发现,情境婚姻暴力中夫妻双方都有参与,单次婚姻暴力普遍经历了从言语激化到肢体暴力的过程,在互动过程中,妻子多是言语攻击的发起者和激化者,躯体暴力则多为丈夫发起和终止;从纵向发展看,婚姻暴力中言语交流、言语攻击和肢体暴力的强度和持续时间随着婚姻暴力的发展而变化,躯体婚姻暴力经历短时间的加剧后逐渐趋向减弱,但冷暴力变得日趋频繁和强烈。

**关键词:**婚姻暴力;互动视角;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C9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1-0038-07

### 一、引言

家庭暴力,尤其是针对妇女的婚姻暴力,一直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2016年我国正式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将家庭暴力界定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即家庭暴力既包括了肢体暴力,也包含了精神暴力(语言暴力、冷暴力)、性暴力等。有调查显示,全球15岁以上的女性中有30%左右的在其一生中遭遇过婚姻暴力,在住院病人中遭遇过严重家暴的比例更是高达30~60%<sup>[1]</sup>。2012年我国学者崔轶在7个省市开展的调查显示,夫妻间肢体暴力的发生率为34.8%,精神暴力发生率为55.6%<sup>[2]</sup>。

婚姻暴力作为公共健康问题,会给家庭成员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与从未遭遇婚姻暴力的女性相比,遭遇婚姻暴力的女性患冠心病、慢性颈椎痛、腰痛等慢性疾病和慢性疼痛、羸弱的功能性健康疾病、疑难杂症、性病等躯体和身心疾病的几率更高,出现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症、自残以及睡眠障碍等精神问题的可能性更大<sup>[3]</sup>。婚姻暴力同样增加了男性抑郁、自杀等严重心理症状的可能性<sup>[4]</sup>。同时,父母之间的暴力也给儿童的生理和认知发展,心理和行为健康带来短期和长期的负面影响<sup>[5]</sup>。

婚姻暴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和严重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研究中也形成了两种理论<sup>[6]</sup>:一是女权主义理论,认为婚姻暴

收稿日期:2018-10-17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双重家庭暴力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7SRC023)

作者简介:向小平,女,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工作研究;王晓婷,女,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工作和社会管理研究。

力是男性控制女性、维持自身主导地位的一种手段,其根源是父权制下的性别不平等;二是家庭冲突理论,强调家庭暴力是由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所引发的,是夫妻间的冲突和分歧未通过讨论、协商、妥协等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而升级的结果。Johnson 结合前人研究,提出这两个理论的争端主要因研究对象不同而引起<sup>[7]</sup>;前者的研究集中于相关机构中的受暴妇女,她们遭受的多是男性实施的严重暴力,其目的在于强制性的完全控制受害者,Johnson 将这种暴力称为亲密恐怖主义(Intimate terrorism);而后者多来自对普通大众的调查,这些研究发现男女两性发起和参与暴力的频率相当,其暴力行为是特定情境下一方或双方的紧张情绪导致的,Johnson 称其为情境夫妇暴力(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研究指出,情境夫妇暴力是最常见的暴力形式<sup>[8]</sup>。国内学者徐安琪的调查也显示,上海丈夫打妻子的发生率为18.6%,但其中经常性动武的仅占1%~2%,绝大多数是偶尔的一时冲动下失手<sup>[9]</sup>。

在 Johnson 的基础上,Wilkinson 进一步指出,女性主义和家庭冲突理论的差异不仅在于研究对象不同,关注的视角也有差别<sup>[10-11]</sup>。整体而言,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宏观理论,看重社会结构对家庭中男女两性权力对比的影响,而家庭冲突理论则更关注个人的冲突解决策略,暴力只是作为策略之一,这两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忽略了参与暴力的双方互动的情境和过程,因而他提出了婚姻暴力的互动理论(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他也称为事件理论,event perspective),认为对婚姻暴力的完整理解还需对家暴这个事件本身,即暴力发展的前因、进展及后续情况进行研究,并关注社会文化、关系和情境因素对互动过程的影响<sup>[12-15]</sup>。其中暴力的互动过程既包括单次暴力的发展过程,也包括暴力的纵向发展过程。Wilkinson 认为单次暴力主要有三个非线性的发展阶段:就冲突的内容而言,一开始双方的冲突多由具体的生活琐事引起,然后对冲突如何解决进行争吵,最后会试图结束冲突;冲突的形式也经历了从语言交流到语言攻击,到或明或暗的武力威胁直至轻微或严重的躯体暴力。从纵

向发展来看,Wilkinson 指出理论上暴力在一段关系中可能呈现出稳定、加剧或减弱三种不同的模式,在某一段时间多种发展模式可能交替,但实际上比较常见的是暴力在短期内加剧但长期逐渐减少甚至终止<sup>[10-14]</sup>。与此不同,早期的 Walker 基于对受虐妇女的研究提出的暴力循环理论指出婚姻暴力存在紧张状态建立、暴力爆发和爱的悔恨三个阶段,暴力一旦发生,就可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一般不会自动停止,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暴力会愈演愈烈,施暴者也将不再道歉<sup>[16]</sup>。笔者认为,Wilkinson 和 Walker 所指出的暴力阶段的差异可能跟他们研究的暴力类型不同有关,参考 Johnson 的分类可看出,Walker 的研究更多集中于亲密恐怖主义暴力,而 Wilkinson 研究的多是情境夫妇暴力,因情境夫妇暴力更普遍,Wilkinson 的理论对情境夫妇暴力可能更有指导意义。但目前针对情境夫妇暴力互动过程的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这在我国尤其如此。徐安琪详细地介绍了 Johnson 对暴力的区分,郁之虹强调家庭系统与社会系统间的互动<sup>[17]</sup>,但目前尚未有从夫妻互动视角探索一般家庭暴力的实证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对遭遇情境夫妇暴力的夫妻的访谈,系统梳理在整个婚姻历程中婚姻暴力发生、发展和维持阶段夫妻双方的互动过程及情境性影响因素,分析导致家暴行为的互动特点,一方面补充已有研究,另一方面也为家暴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新思路。

##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一)研究方法

笔者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对两对夫妻双方单独进行访谈,内容主要为第一次、最严重的一次以及最近一次婚姻暴力发生的前因后果和互动过程,并以之分别代表婚姻暴力的发生、发展与维持阶段。

### (二)研究对象

考虑到代际差异、婚龄时长及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对互动过程产生影响,根据目的性抽样和方便抽样相结合的原则,本研究选取两对不同年代、不同婚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夫妻。两对夫

妻遭遇的家庭暴力均满足情境夫妇暴力的特点:在暴力频率、强度等方面都没有展现出蓄意伤害

的致命特征,且目前仍处于婚姻关系中。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认识方式	婚龄(年)	子女情况	三次暴力发生的时间(婚后第几年)		
								第一次	最严重	最近
F1	女	53	高中	农民	他人介绍	31	两女	2	8	29
M1	男	56	高中	农民						
F2	女	36	本科	护士	相亲网站	6	一子	2	距第一次3个月左右	6
M2	男	37	本科	职员						

### 三、研究结果

#### (一)发生阶段。

1. 缘由:婚姻初期的适应不良。两对夫妻第一次婚姻暴力发生的时间都在婚后第二年,缘由主要是个人单方面的决定引发另一方的不满。

2. 互动过程:语言刺激激发暴力。在M2与F2的互动中,F2一开始想与丈夫交流辞职的原因和对未来的打算,语气相对平缓,但M2一直不理睬,导致F2更多的担忧和询问,引发了M2的反感。在M2的叙述中,他用“一直不停地”“逼问”来形容妻子的询问,在“不回应”无效后,直接“推开妻子”来结束冲突。这一方面证实了Wilkinson的理论,双方在经历言语交流、言语攻击后最终发生了暴力,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激化过程并不一定由话语激化,一方言语攻击而另一方冷漠回避也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在M1与F1的互动中,双方几乎是省略了平和的言语交流阶段,直接升级到言语攻击。M1一开始就愤怒地质问妻子为什么要烫发,指责妻子的做法违背其意愿,面对M1的不满,F1也没有退让,以“烫头发还要商量你啊,头长在我自己身上,关你什么事”来回应,这进一步激起了M1的情绪,并快速转化成了躯体暴力。

第一次家庭暴力的发生对双方而言都是一次激烈的突发事件,夫妻双方从言语交流到言语攻击,在快速上升且强度巨大的情绪裹挟下,进一步发展成肢体暴力。在暴力实施中,丈夫并非是蓄意地进行严重、持续的殴打,妻子更多感觉到的是震惊、受伤和一定程度上的不能相信或接

受,因而在行为上并未表现出太多的反抗。肢体暴力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夫妻双方几乎不存在行为上的交互。

3. 应对:继续维持婚姻。暴力过后,F1先是回了娘家,但父母劝其回去与丈夫继续过日子,在父母的催促下,F1回到了夫家,并通过媒人调解促使M1道歉。F2在第二天主动与丈夫沟通,双方和好。

#### (二)发展阶段

1. 缘由:家庭经济的支配。最严重的家庭暴力事件中,F1与M1的核心冲突点在于赡养费。M1在其三哥的添油加醋下认为F1帮其母亲代领养老金时私自扣留了一部分,实际上F1每次还添了150元凑成1000元给婆婆。F2与M2的冲突起缘于装修师傅的工钱给付方式。M2想全部弄完再结算,F2计划一天一结,但他俩之前并无沟通且之前的工作都是F2一人在负责,当M2看到F2在师傅刚干完一天就给钱时,加之M2当时工作压力大,情绪就爆发了。

2. 互动过程:强烈的语言对抗到互殴。与家暴的严重性相对应的是,夫妻间的互动过程也更加激烈和消极,呈现出了相互对抗、互不相让的状态。F1回到家立马以“你们是不是人”这样具有强烈指责性的语言来质问M1,M1也未作任何解释和争辩,以边骂边打来回应:

F1:“当时我说你们算不算是一个人啊,怎么能这样欺负人呢,他马上就火了,就骂我,一边骂我一边用手打我,把我推倒在地上,这时候我也豁上命地去

骂他去撞他,想从地上爬起来,可他揪着我的头发,坐着我的腰,打了我好一阵。”

F2与M2的互动过程同样充满了强烈的语言和对抗:

F2:“他就突然发脾气,然后开始骂人,我当时也挺生气的,他骂我什么我就指着他还嘴,他打我我也打他,然后他就停下车把我拖出去掐着我的脖子打,推在地上打,而且非常严重,他可能就觉得,反正我已经打了,你要报警还是离婚随便你,我就要打个饱。”

互动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交换过程,一方表达出消极的言语、情感和和行为时,另一方也很难保持克制,两方互相激化,互骂、互殴便出现了。同时,与第一次家暴相比,最严重的这次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两对夫妻的互动都没有了平心静气的交流阶段;其次,言语攻击和行为攻击没有了明确的界限,M1与F1的“边骂边打”就体现了这一点;最后,与第一次相比,妻子的无所适从、幻想破灭等被动情绪逐渐被主动回击所取代,单纯的被打演变成互殴。但妻子的反抗激发了丈夫的控制欲,加之男女生理上的差异,丈夫在行为上更加压制妻子,互殴很快就变成了丈夫主导的局面。

3. 应对:外在系统的保护与警示作用。两对夫妻最严重的一次暴力都在外界干预下结束,F1与M1是被邻居拉开之后打110报警,F2当时就报了警。事后F1和F2都去过医院验伤,并提出了离婚。但考虑到孩子,且在民政局的劝说调解之下,离婚未能成行。但报警和尝试离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保护女方和警醒丈夫的作用,两位丈夫都在外界的干预下承认了错误,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再发生严重的婚姻暴力事件。

### (三)维持阶段

1. 缘由:家务分工。此次家庭暴力中,F1因与M1的弟弟约好来家吃饭,其却临时失约而气愤,M1则认为F1并非心甘情愿招待弟弟,让自己失了面子,二者在理解上的差异引发了冲突。F2因M2以“需赚钱养家”为由不参加孩子的学

校活动而唠叨,引发了矛盾。

2. 互动过程:强度下降,自我克制增加。M1与F1的互动与前次相似,F1率先发问且语气强烈,M1被激惹后暴力回应:

F1:“我当时也是非常生气,就说你看我准备了一下午的饭菜,都这样了他又不过来吃,说不来吃不早告诉声嘛,可能当时我说话的口气也是很生气,我刚说完,他马上就烦了,骂我说你不是想找事啊你(哭),又想挨打了吧,最后说着说着(哭)他就打了我(哭)。”

M2与F2的互动也呈现出与前几次类似的模式,F2试图与M2讨论,未得到积极回应后继续唠叨,M2就用暴力终止F2的唠叨:

M2:“我跟她说我工作上还有些事情,告诉她我去不了,她跟没听到似的,说什么可以让别人做,就一直问怎么不去,让赶紧收拾下过去,她一旦说了就停不下来,一直不停地说,你耳朵根本清闲不下来,我就给了她一巴掌。”

家庭暴力进入维持阶段后,且随着年龄、婚龄的增长,两对夫妻在言语交流和言语攻击上的时间明显拉长,在表达观点和发泄情绪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克制的倾向,比如M1在实施暴力前就提出了“又想挨打了吧”,这既是对F1的提醒和威胁,实际上也是一种隐藏的避免实际暴力的手段。M2也尝试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并且努力忍耐妻子的唠叨。此外,躯体暴力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也在降低,F1在挨打后选择了躲开,M2也在妻子连喊带打扑过来扭打几次后停手。

3. 应对:自我反思与克制,冷暴力增加。在暴力行为给身心带来巨大伤害后,作为主要受害者的妻子逐渐学会保护自己,尤其反映在行为交互上,逐渐放弃了以命相搏的心态,“不吃眼前亏”,感觉丈夫快要失控时“不骂不打不闹”,克制自己不激怒丈夫。在平时生活中也尽量避免冲突的升级,其中F1的主要策略是忍,“没有其他办法,熬到死了就算了吧”,反映了其应对的被动,F2则希望更多矛盾在激化前通过和平沟通解决。两位丈夫在施暴后也普遍有了一定的悔意,

但并未出现 Walker 所描述的蜜月期,而是等着“时间慢慢挽回”,但在冲突进行中开始有意识地忍耐与克制。

此外,两对夫妻均开始通过冷暴力来减少身体上的伤害:

M1:“所以说就爱造成语言上的谁都不服谁,打,伤害太大了,年纪也大了,就互相冷淡不搭理,最后我们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各自都不理对方,我也不搭理她,她也不搭理我,好长时间我们都不说一句话。”

M1:“没什么和好不和好吧,就是那样,一开始估计她也觉得挺委屈的,我们两个也不爱搭理,后面因为其他的事情也不得不说话,生活还得继续。”

## 五、讨论

(一)互动过程作为一种交换,推动了家庭暴力的发生、发展与维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两对夫妻的三次婚姻暴力中,均是夫妻双方都有参与,所以正如 Bates<sup>[18]</sup> 和 Wilkinson<sup>[12]</sup> 所指出的,暴力是相互的动态推进过程,一方的敌意行为引发另一方的敌意,双方互相激化,最终导致了冲突的升级和暴力的发生,孤立地从这个动态发展进程中截取一个行为,定义一方是施暴者另一方为受害者,或者如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一律把男性当作施暴者把女性看作受害者显然是把复杂而丰富的现实简单化了。

虽然婚姻暴力过程中夫妻双方在语言和行为上的互动很多,可 Wilkinson 认为这些互动总体上可分为三个顺次的发展阶段<sup>[10,13]</sup>:言语沟通、言语攻击和躯体暴力,Giordano 的实证研究则指出婚姻暴力存在争议事件、言语激化和躯体暴力三个阶段<sup>[19]</sup>。本研究发现躯体暴力之前普遍都有言语攻击或言语激化这个阶段,但言语沟通并非每次都存在。此外,每个阶段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也随着暴力发展的进程而变化。夫妻双方因冲突未解决所累积的敌意情绪持续存在,于是转化成了冷暴力。

最后,从暴力的纵向发展过程看,两对夫妻

从第一次到最严重一次家暴的间隔时间都相对较短,第一对夫妻相隔了 6 年,第二对夫妻相隔了 3 个月,然后躯体暴力的强度开始减弱,但同时冷暴力的强度和频率开始增加,这一方面证实了 Wilkinson 所说的随着年龄和婚龄增加夫妻双了解程度增强,以及在暴力造成伤害后夫妻双方有意识的自我调控能力增加,情境夫妇暴力逐渐减弱;但另一方面也需指出,对家暴发展阶段的研究还需重视“热暴力”向“冷暴力”的转化及其危害。

(二)家庭暴力的互动过程中性别关系、社会支持以及代际的影响

Wilkinson 认为家暴的发生、发展和维持受情境的影响<sup>[13]</sup>,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有社会文化、夫妻关系及暴力发生当时的具体情境。本研究主要讨论三个因素的影响:性别关系、社会支持和代际差异。

首先,本研究发现虽然婚姻暴力并非如女性主义者所说的是男性对女性强制性的完全控制,但权力与控制以及两性不平等在 Wilkinson 所讲的暴力行为的动机、行为和后果三个方面都存在。第一,从暴力发生的缘由和实施暴力的动机来看,两对夫妻三次冲突的起因分别涉及婚后个人自主权、财务支配以及家务分工,本质都是婚姻中控制权的争夺和义务的分担,但在这三次冲突中,基本都能看到两性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等,女性处于弱势地位。比如第一次冲突 M1 因妻子私自染发不符合自己要求引起,M2 觉得妻子不该插手自己辞职的事情引发矛盾,都是认为男性有控制女性的权利,而女性则不应该对男性的自由有太多干涉。从暴力的结束看,在夫妻无法通过争吵解决冲突时,三次暴力都是丈夫用武力的方式让妻子闭嘴。第二,从暴力行为来看,虽然妻子同等程度地发起和参与语言暴力,甚至是语言攻击的主要维持者,但躯体暴力都是男性先动手。第三,妻子也是主要受害者。三次暴力中都是女性受伤,F1 也正是因为被打怕了所以开始通过躲避、忍等方式来回避暴力。所以正如 Wilkinson 所指出的,承认互动中双方参与并不代表责任上的对等,也不表示暴力研究中无需性别

敏感。

其次,两对夫妻在第一和最严重一次家暴后都寻求过外界支持,但这两次支持的效果是不同的。F1 在发生第一次暴力后先后寻求娘家及媒人的支持,F2 也曾寻求母亲的支持,但他们都劝和不劝离,因而并未促成夫妻关系的实际性改变,正如 Wilkinson 所指出的第三方以求表面和平的调解方式难以促进暴力问题的解决<sup>[12]</sup>。到了最严重的一次暴力,两位妻子都报了警,接 F2 电话的还是一位女警,在听到现场的惨叫后迅速出警,当下把 M2 带回警局询问,留下了笔录。虽然在民政局的调解下没有离婚,但 F2 借此要求 M2 写下不再打老婆的保证书,其遭受家暴的笔录也成为要求离婚时有力的证据,从与 M2 的交谈也可以看出,妻子报警和要求离婚对其有较大的警示作用,他在访谈中多次提到“那次她把事情闹得天翻地覆的,又报了警又闹到法院,事后我自己也在反省吧,以后的相处需要多注意些”。可见警方、法院等的强力介入比夫妻都认识的第三方的介入有更大的警示作用,但这种警示作用的效果是有限的,如果夫妻之间的冲突未解决,他们从政府机构得不到持续支持,又无法真正离婚,报警的效力会逐渐减弱和消失,这从 F1 最终只能选择忍、熬等方式应对家暴,而 F2 对是否离婚的纠结均可以体现。可见要促进家暴的解决,仅在出现严重暴力的情况下由警察短期介入是

不够的,后续的干预还需考虑提供夫妻咨询等支持性服务。

最后,虽然两对夫妻的家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还是呈现出一些明显的代际差异。F1 和 M1 作为“60 后”,年龄大婚龄长,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也较大,因而 F1 在家暴后有更多的接纳和忍耐,M1 虽然在思想上认为自己需要克制,但改变的举动不多。相比之下,F2 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80 后”,有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对家暴的容忍程度明显要低,在家暴后反应也更加主动积极,这一方面体现在发生家暴后主动要求沟通,另一方面在发生严重暴力后也通过报警、去民政局要求离婚等方式明确表示不容忍,这样强烈的态度也促使 M2 作了更多的改变。

本研究从整个婚姻历程的角度探讨了夫妻双方在家暴中的互动过程,是国内运用互动视角分析情境夫妇婚姻暴力的首次尝试,其发现有利于加深对家暴互动过程的了解。但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研究对象只有两对夫妻,资料的代表性、丰富性欠缺;第二,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家暴前后夫妻间的消极互动,忽略了积极互动,而支持性的互动往往是夫妻关系得以维持的纽带,也是促进夫妻关系改变的基础。未来的研究可以加大样本量,并从积极和消极互动两方面对家暴夫妻的互动过程进行探索,以更清晰地认识家暴的互动机制和可以改变的条件。

#### [参考文献]

- [ 1 ] HOWARD LM, TREVILLION K, KHALIFEH H, et al. Domestic violence and severe psychiatric disorders: prevalence and interventions [ J ].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10, 40(6) : 881-893.
- [ 2 ] 崔轶, 洪炜, 苏英, 刘晓柳. 七省市家庭暴力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报告 [ J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3(40) : 360-362.
- [ 3 ] DILLON G, HUSSAIN R, LOXTON D, et al.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 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mily medicine, 2013(5) : 1-15.
- [ 4 ] RANDLE AA, GRAHAM CA.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on the effect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on men [ J ].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2011, 12(2) : 97-111.
- [ 5 ] PRAKESH SS, JYOTSNA S. Maternal exposure to domestic violence and pregnancy and birth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es [ J ].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2010, 19(11) : 2017-2030.
- [ 6 ] WINSTOK Z. Toward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o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 J ].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07, 12(3) : 348-363.
- [ 7 ] JOHNSON MP, FERRARO KJ. Research on domestic violence in the 1990s: making distinctions [ J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0, 62(4) : 948-963.

- [ 8 ] JOHNSON M P. Typology of domestic violence: intimate, terrorism, violent resistance, and 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 [ M ].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8: 61-62.
- [ 9 ] 徐安琪. 婚姻暴力: 一般家庭的实证分析 [ J ]. 上海社会科学院季刊, 2001 ( 3 ): 156-165.
- [ 10 ] WINSTOK Z. Partner violence: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conflict escalation [ M ].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2.
- [ 11 ] WINSTOK Z. The paradigmatic cleavage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tner violence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 [ J ].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11, 16 ( 4 ): 303-311.
- [ 12 ] WILKINSON DL, HAMERSCHLAG SJ. Situational determinants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 J ].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05, 10 ( 3 ): 333-361.
- [ 13 ] WINSTOK Z. Toward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o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 J ].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007, 12 ( 3 ): 348-363.
- [ 14 ] WINSTOK Z. Conflict escalation to violence and escalation of violent conflicts [ J ].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08, 30 ( 3 ): 297-310.
- [ 15 ] WINSTOK Z. From a static to a dynam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artner violence [ J ]. Sex roles, 2013, 69 ( 3 ): 193-204.
- [ 16 ] WALKER, LEA.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 M ]. Berlin: Springer Publishing Co, Inc. 1999.
- [ 17 ] 郁之虹. 家庭系统理论视域下的家庭暴力——互动因果的矛盾循环格局 [ J ]. 社会工作, 2014 ( 6 ): 82-90.
- [ 18 ] BATES EA. Current controversies with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overlooking bidirectional violence [ J ].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16, 31 ( 8 ): 937-940.
- [ 19 ] GIORDANO PC, COPP JE, LONGMORE MA, et al. Anger, control,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young adulthood [ J ].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016, 31 ( 1 ): 1-13.

##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Persistence of Marital

### Violence from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An Interview Study Based on Two Couples

XIANG Xiao-ping, WANG Xiao-ting

(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

**Abstract:** Guided by the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interviewed two couples from different ages and economic backgrounds who had suffered 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 to explore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persistence of their marital violence. It was found that both parties actively involved in violence, a single episode of violence generally followed the process from verbal amplification to physical aggression, and the wife is often the initiator and promoter of verbal attacks, while the husband usually started and terminated physical violence. Looking at the successive violence from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duration of verbal communication, verbal attack and physical violence chan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al violence, physical violence weakened after a brief time of intensification, but emotional abuse became more frequent and intense.

**Key words:** marital violence;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process

(责任编辑 文向华)